（上接 12 版）

1935 年出版的《开明音乐教本·唱歌编》，也均用外国曲填词。这几首原词未署名，系丰子恺子女从风格推断为丰子恺所撰，或有不确。如《浩歌》（“当空发长矢/矢去如流电……”）原为美国诗人朗费罗的名篇“The Arrow and the Song”，书中用的是胡怀琛的中译文，曾收入胡怀琛 1921 年初版的诗集《大江集》。几首原创歌曲《幼女之愿》《我们四百兆人》《弥陀学校校歌》《桂林师范学校校歌》《庆祝胜利》，丰子恺仅是词作者。唯一由他作词兼作曲的是 1932 年的《崇德县立第三小学校歌》。崇德三小为丰子恺母校，这首校歌旋律简单，只有 A 段 8 小节，B 段 4 小节两句，一般音乐爱好者不难写出。此外，一些书中称丰子恺在上虞春晖中学任教时曾创作春晖校歌，用孟郊《游子吟》原诗谱曲。但丰一吟 1992 年致信叶瑜荪时已指出：“春晖中学误以为丰作曲，其实曲是西洋曲，丰只是配而已。”这些后人努力搜集的丰子恺作品均不能体现他具备作曲功底。如果他曾写出复旦校歌这样规范的四部和声曲谱，应不至于只留下一首简短的歌，其余都需套用现成曲调或由他人谱曲。

1934 年秋季学期开学时，在复旦大学的新生指导会上，“由高中、实中、附中升上之‘新人’，坐于头排，领导唱校歌，歌调庄严雄壮，为从来开会情形中之创见”（《新生指导会杂记》，载 1934 年 10 月 1 日《复旦大学校刊》）。至此，复旦的学生已掌握了校歌，后多次在集会活动中演唱。不过校歌新谱还没有立即在外地的复旦同学中普及。1936 年 5 月，由复旦毕业生创办的广州复旦中学编印了《私立广州复旦中学校一九三六年秋季同学录》，校歌仍使用旧版曲谱。抗战期间，复旦西迁，从私立改为国立大学，1946 年回到上海复校。从战时出版的《复旦大学二八级毕业纪念刊》（1939）到民国末年的《国立复旦大学 1949 级毕业同学纪念刊》，收录的都是 1934 年的新版曲谱。1950 年后的复旦刊物上，校歌未再出现，就此埋没。1957 年考入复旦中文系，1962 年毕业并留校任教的陈四益便全然不知复旦曾有校歌：“直到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北京开校友会，会前发的材料中才见有校歌一首，颇感诧异。”（《如是我闻：为复旦百年华诞作》）五十多年后，这首在复旦校中曾两度被遗忘的校歌才又重新传唱。2014 年，《复旦大学章程》正式通过，在第七章“学校标识”中辟有专条，表述为“学校的校歌创作于 1925 年，由刘大白作词，丰子恺作曲”。中断的传统虽已恢复，史实却仍有待澄清。■

“后真相”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

曾被误解为“科学公敌”的他，能帮助科学夺回权威吗

编译/本报见习记者 **陈瑜**

拉图尔认为，如果科学家们能够把科学如何运作的过程透明化，他们将更能让人们相信他们的主张。“气候学家们必须意识到，作为大自然的指定代表，他们一直是政治角色，他们是一场难分胜负的战斗中的士兵。”他这样说，“如果科学家们不再认为自己只是参与科学研究而与政治隔绝的人，那么战局将可能出现转机。”

布鲁诺·拉图尔，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S.T.S（科学、技术与社会）巴黎学派的创立者，2013 年获得霍尔堡国际纪念奖。代表作有《实验室生活》《科学在行动》《我们从未现代过》《自然的政治》等。拉图尔的作品不拘一格，其中有关于法国最高法院的民族志，颂扬宗教演说之困难性的赞歌，一出描绘巴黎街头的混合媒体“歌剧”，以及一部以巴黎地铁为第一人称叙述的，对地铁系统故障的调查。

“你相信现实吗？”

1996 年的夏天，在巴西举行的国际人类学会议上，法国著名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被一位面带愁容的心理学家拦下，对方称有一个难以启齿的问题，希望在一处僻静的地方与他见面。于是，在他们所在度假村的湖边，这位心理学家踌躇了许久，终于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问道：“你相信现实吗？”

有那么一会儿，拉图尔以为他只是想开个玩笑。的确，拉图尔早期的著作是在试图颠覆人们对科学研究和知识真实性的传统理解：例如，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科学事实和实体在被发现之前就已经客观存在，比如细胞、夸克、朊蛋白等等；但他却认为，科学事实应该被视为科学研究的产物。在发表于 20 世纪 70—80 年代间一系列颇有争议性的著作中，他试图强调科学研究的建构作用。拉图尔说，事实是“联网”的——它们不是凭借其与生俱来的“真实性”生存或毁灭，而是依赖于研究机构和实践的力量，制造它们并让其变得易于理解。如果这个网络崩溃了，事实也将不复存在。

可是，拉图尔并没有想到自己的观点在某些人看来会如此激进和荒谬，以至于让他们开始质疑现实。作为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简称 S.T.S.）的领军人物，他一直将自己和同事视为科学的坚定盟友。“当然，我相信现实。”他告诉心理学家，仍确信这段对话是开玩笑的。然而，从对方如释重负的表情中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是被认真提出来的。

这位心理学家并不是第一个担忧科学体系受到攻击的人。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所谓“科学战争”的年代，“现实主义者”与“社会建构主义者”（如拉图尔）之间就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公开辩论。前者宣称，事实是独立和客观的；而后者则认为，这些事实是由科学研究所创造的。现实主义者担心，如果科学知识是社会构建的，因而是局部的、可疑的、偶然的，那么这怎么可能不会削弱对现实的宣称呢？在这场论战的高潮中，一位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误认为拉图尔和他的 S.T.S. 同事认定“物理定律仅仅是社会习俗”，请他们试试跳出其所居住的 21 层公寓楼的窗户。

当时，这场科学战争也波及了学院围墙外的普通大众。然而，这些辩论在今天看来更像是“后真相时代”的前奏。过去十年，一种反科学的思维方式在人群中大肆蔓延——去年，只有 37%的保守派共和党人相信“全球变暖”，相比 2008 年的 50%有大幅下降。从网络流行的“阴谋论”，到宣告一些严谨的科学知识的“死亡”，各种蒙昧主义在今天盛行。而 2016 年，特朗普的上台似乎更是代表了这场认识论“腐化”的高潮——这位总统通过狩猎大众的情绪以炮制事实，宣告了“后真相”政治时代的来临。“你相信现实吗？”这个问题，现在一半的美国人也想问总统和他的大批支持者。

因此，许多人担忧并指责拉图尔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他们将我们今天面临的境况归咎于像拉图尔这样的“后现代主义”者。拉图尔本人也担心过同样的问题，早在 2004 年，他就公开表示担心自己最关键的理论武器，会被“走私”到大公司所资助的气候怀疑论者手中，被他们用以对“气候变暖”这一科学共识发起攻击。但是，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的知识分子们都似乎夸大了法国理论的影响力。如果存在影响，今天的“后真相时刻”也只是对拉图尔理论的确证，而非它们的产物。就像一个人生病时才会开始注意自己的身体那样，只有当拉图尔所说的科学事实所依附的“网络”受到攻击时，我们才意识到这些研究机构在产生和维持知识的真实性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从本质上来看，这是拉图尔最新著作《脚踏实地》（*Down to Earth*）的前提。该书于 2018 年 11 月在美国出版，是对现在“后真相时刻”的极具启发性和反直觉的分析。在拉图尔看来，记者、科学家和其他专业人士长期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只有拥有共同的文化，可以信任的制度，较为体面的公共生活，以及还算可靠的媒体，一种强健的事实才能被支撑起来。”显然，一系列另类事实的“崛起”表明，一个陈述能否被人们相信，并不取决于它

（下转 14 版）